

《九成宫醴泉铭》拓本源流考

米辰 彖

和别的名牌商品一样，《九成宫醴泉铭》（以下简称《醴泉铭》）拓片自从唐末以来，就有许多“假冒伪劣”者混迹于原石精拓之中流布国内外。直到一千三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在宋拓“李祺本”和“端方本”的影印本早已广泛普及的背景下，中国乃至日本仍然有不少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兜售翻刻本、伪刻本及其影印件。这种鱼龙混杂的现实，对于我们那些景仰欧体字但又不太熟悉拓片源流的一般爱好者来说，作一点考证和辨析似乎是很急需的工作了。这里所说的考证，不仅包括各种拓片之间的先后、真伪辨析，还有相关的知识阐述。

先从有影印本的拓片说起。

远百年来，在中国和日本，先后影印出版的《醴泉铭》拓本主要有：①

（北宋拓明驸马李祺旧藏本，原拓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1）中国，文物出版社1962年精印本，1981年普及本。

（2）日本，二玄社《原色法贴选》NO.20。

（3）日本，清雅堂板B本。

（南宋拓清端方旧藏本，原拓现藏日本三井文库）

（4）中国，商务印书馆1920年（民国九年）影印。

（5）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NO.19（略少）。

（6）日本，二玄社《中国法书选》NO.31（原大）。

(7) 日本，清雅堂版A本。

(8) 明清内府大库旧藏本（简称“库装本”），现藏北京故宫，无影印本。

(9) 日本，二玄社《听冰阁墨宝，原色法贴选》NO.40，南宋拓清李鸿裔旧藏本，原拓现藏日本三井文库。

(10) 中国，艺苑真赏社影印本，南宋拓云卿旧藏本，后有梁献题。

(11) 中国，中华书局影印本，南宋拓岳雪楼旧藏，后有汪士铉等跋。

(12) 中国，有正书局《翁藏宋拓九成宫》，翻刻本，翁跋伪。远年有北京中国书店，天津古籍书店影印本。

(13) 中国，艺苑真赏社两种翻刻本，其一是秦刻本，另一有梁同书跋，伪刻。

在我们逐一介绍拓本之前，先扼要地回顾一下拓本之母——碑石的有关历史是必要的。很显然，不同时期的拓本文字损泐程度不同是由于不同时代碑石的完好程度不同所致。

九成宫是隋唐时代的皇家离宫，座落在今陕西省麟游县杜水河之阳。它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开皇十五年（595年）建成。唐贞观五年（631年）太宗李世民重修，更名“九成宫”。

九成宫醴泉铭石碑原立在麟游县城西端北马坊河口，天台山麓，离县城约二公里多。唐贞观六年（632年）四月立石，检校侍中魏征撰文，弘文馆学士兼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丹。据说，原石采用的是西安北五、六十公里处的富平石。碑高2.25米，宽约0.90米，厚约0.25米，直立在一青绿色的龟趺上。碑首呈半圆形，有浮雕蟠龙，形象生动。篆额书“九成宫醴泉铭”六个大字，每字约10厘米见方。碑文格线约3.5厘米见方（即古之所谓“寸楷”），每行50字，共24行，实数为1109字（91个空格）。

铭文记述了唐太宗李世民在九成宫无意中发现涌泉的原因、经过及其意义。虽然古之铭文总以歌功颂德为主，但《醴泉铭》尚有“居高思坠，为持满戒溢，念兹在兹，永保贞吉”等劝戒之词，足见魏征为人文之不凡品格。

和其它古碑一样，《醴泉铭》放立之时及其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是露天的。虽然有传说历代王朝似乎都保护过石碑，大都无稽可考。最早的较可靠的保护性记载始于清嘉庆八年（1803年），

“崇文重教”的知县瞿云魁将倒卧荒野的碑石扶起重立，构筑小屋一间，聊蔽风雨，并另勒一石，以志其事。碑文曰：“雨蚀风摇已日久，残碣飘零，卧老荒烟岁月□，于是聊兴小构，簿椽偏隅，庶彩笔流传，俾有卫护，以待后之君子，望古而遥集云尔。”^②上述引文转引自麟游县博物馆的一本粗糙的内部铅印本《麟游胜迹》，也许个别文字尚有不确，但它给我们提供的下列信息已明白无疑：

1、碑石在嘉庆时已倒卧很久。

2、“残碣飘零”似乎是说碑身已断裂多处，扶立工作中也许还包括重新拼接（这一推想能从那时以后的拓片得到验证。明末清初之整拓片，至少有贯通碑身的四条裂纹，龟裂花纹不计其数）。

3、它没提到此前有过任何保护、修葺。

4、它预言此碑必有“后之君子望古而遥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接下来有据可查的是，1959年，陕西省文管会拨款重修了小屋。1986年又改建扩建为亭，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经1000多年的风雨剥蚀，现在碑基铸铁已经腐蚀，碑文底部两行文字大部分损泐。原刻之格线早已荡然无存。字迹笔划纤细。人们较普遍的看法是，明代以前碑身主要受大自然的侵蚀。但明末清初以后，就开始出现了人为破坏的痕迹。一是字画商

人，他们为了使自己的拓片有“绝后”的价值，每捶拓完一批以后就有意凿损一个字。当整碑的缺字残字过多时，后来又有人给予重新剜刻挖补。这些人中除了那些想通过补字使拓片增值的商人外，自然也会有修桥补路行善积德的君子。然而遗憾的是，由于补刻者的学识和技艺大都低于唐人，使补刻的客观效果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破坏。据县博物馆的同志估计，现存的字迹中至少十有六、七是后人补刻的。通观全碑（及其晚近的拓片），良莠混杂。碑文深浅大异，拓片自然就粗细不一。加之结构扭曲变形，行间湮漫错落，使新近的拓片几乎完全失去了欧字原始的风貌。如果有人还愿意承认它是《醴泉铭》，那么我认为有必要郑重指出，这已经是一种强加于古人的说法了。它可以叫做后人的一件百衲衣，或是一首由后人和风雨共同谱写的混声合唱曲，欧阳询在其中的作用和意义，只是隐约其后的一个影子，或一面招魂的旗帜而已。我们现代崇尚欧字的人们，如果不分辨拓片的早晚和优劣，追随这一类所谓“原石拓片”去临摹、研究，即使不是认贼作父，至少是张冠李戴了。

至今流传在世的《醴泉铭》拓片究竟有多少？据清代编纂的《麟游县志》说，自唐初立碑以后，远道而来拓碑者络绎不绝，捶拓碑板的“叮咛之声，昼夜不息”。^③我们可以据此作一个大概的推测。“信而好古”的现代日本人，临习、研究欧字者为数尤其众多，有关《醴泉铭》碑帖和研究论著的编辑出版，其数量和质量都远在中国之上。单说1985—1986年，万里迢迢前往麟游瞻仰古碑的日本人就有近200人！风气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上述12种影印本碑帖，究竟孰先孰后，孰优孰劣呢？

李祺旧藏本

近现代的碑帖鉴赏家普遍认为，明驸马都尉李祺旧藏本是现在已知的传世最早，捶拓最精，损字最少的拓本。该本是1952年

张明善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偶然买到的，先交文化部，后收藏故宫博物院。之所以学术界习称为“李祺本”，是因为该拓本最早的收藏者是明代的李祺。李祺在“明史”第一百二十一卷有传（中华书局点校版第3662页）。据已故庆云堂碑帖鉴赏家张明善先生考证，李祺曾收藏有《化度寺塔铭》附有赵孟頫、周景远等十三家跋，翁方纲跋万言。还藏有绛帖，可见其为碑帖收藏家。^⑤李祺在他的藏品上留下的印文有“驸马都尉陇西李祺印”（朱文）“李氏子祺”（白文）等。

其后，该拓本归清初大收藏家高士奇所有。高士奇不但收藏宏富，而且精于鉴赏。他在拓本中留下的印文较多，主要有“清吟堂秘笈印”（朱文）、“高士奇印”（白文）、“冷澹生活”（白文）、“澹人”（朱文）等，特别是“江邨秘笈”的朱文小印几乎盖满了每一页残缺文字空白的地方。

再后该拓片归赵怀玉的味辛斋，金绍权的守安堂所藏。还可以看到许多乾隆、嘉庆时期的鉴藏印。诸如“静寄轩图书印”（白文）、“容安珍藏”（白文）、“野云龙山人印”（朱文）等。

1962年5月，该本由文物出版社用珂罗版线装印行，据说印数极少，海内外许多爱好者只闻其名，难得其书。1981年以后，文物出版社才开始多次地大量印刷其简装本。大陆也有别的出版社“偷印”此本。在日本，80年代前曾有书艺文化院将大陆的线装影印本变换版型，在本社法帖集中印行。前几年，二玄社作为《原色法帖选》刊行了彩色精印原装本。最近北京文物出版社也正在积极筹划出版发行彩色精印的李祺本。

关于李祺本的捶拓时间，可惜原本没有古代，特别是乾嘉时代考据家的题跋，现存唯一的题跋是196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影印本时请当时的权威学者张玮（效彬）先生所题的跋。他推断为唐拓。根据该石碑历代不同时期拓本所表现出来的裂纹的粗细、多

少不同，以及采纳有关地震资料的考证，我曾在拙文《李祺旧藏九成宫醴泉铭剪裱本复原拓片工作札记》（以下简称《工作札记》）中推断，李祺本可能的捶拓时限在公元734年3月24—880年2月17日之间。

端方旧藏本

该拓本附有清朝中叶著名金石学家钱大昕、蒋衡、杨守敬、许应曾、朱善旗等人的跋文，其最后归清末官僚，金石碑帖的大收藏家端方所有，因此称为“端方旧藏本”。其后，该本经程琦以及裴景福之手，最后归属了三井听冰阁。直到近年为止，大约私藏了半个多世纪。1920年（民国九年），商务印书馆曾用珂罗版刊行。在“李祺本”被重新发现之前，本世纪初人们一直以为“端方本”是传世最早、最精的拓本，故它的影印本也为时人所重。但由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所限，该影印本没能做到“原大”，稍微缩小了一点。其后日本的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No.19和清雅堂版A本，都因袭了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的失误。只是到了二战以后，二玄社的《中国法书选》才首次作了原大影印。1991年1月，三井文库的善本碑帖初次公开于众，“端方本”也进行了展览。与“李祺本”六字一行的剪裱不同，“端方本”是八个字一行。这样剪裱不仅行气更好，而且更易于较客观地再现原作的格式。该本的封面是木板，内侧裱有宋锦。中央贴着许应曾的隶书题鉴“海内第一唐搨醴泉铭”。墨色仍保有宋拓特有的茶褐色。

这个拓本，清代钱大昕等认为是唐代拓本，张彦生认为是北宋拓本，王壮弘则认为是南宋拓本。我在上引拙文《工作札记》中，推断为从公元880年至1307年（即唐至元）都有可能。

综合说来，上述两种拓本主要有13处文字损泐不同。其中有两处是在“李祺本”中清楚可见，在“端方本”中已完全看不

见。例如第三行末“以人纵欲”的“以”字，另外10处文字是“端方本”比“李祺本”的损泐程度明显严重。例如第二行末“长廊四起”的“四”字。拓本情况请参看封二。另外一个较明显的差别是“端方本”字迹比“李祺本”瘦。可不能据此类推，说所有的早期拓本就一定比晚期拓本肥，不一定。立碑之初的拓本，其字迹的肥瘦程度基本与原石相符。由于捶拓过多，石文字口变肥。后因过份专注捶拓字口又由肥变瘦。^⑥“李祺本”可能是第一个演变期拓的，“端方本”可能在第二个演变期拓的。

库装本

所谓库装本，是明清两朝在北京故宫内府大库收藏的善拓本。清亡，归北京著名收藏家朱翼盒收藏。1953年，朱氏将花费了三十余年搜集到的汉魏六朝及隋唐碑帖七百余种，捐赠给了政府，其中有很多是宋拓珍品，《醴泉铭》即是其中之一。上述碑帖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朱氏著有《欧斋石墨题跋》（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主要是上述碑帖原有题跋的汇集，也有他个人的考证笔录。

朱氏认为，该库装本是北宋拓本。1960年，国家有关部门曾请马子云先生对当时故宫所藏的两种最早的《醴泉铭》拓本进行鉴定。他在李祺本上写的是“北宋早期拓本，霞蔽亏三字未损，珍品甲”。在库装本上写的是“北宋拓，碑文末曾剝凿，珍品乙”。马子云进一步肯定了库装本的珍贵地位。

为什么同是北宋拓本，李祺本那样被世人看重，而库装本却被世人冷落，以至于至今还没有一个影印本问世？近三十年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工作的朱家潘先生（朱翼盒的四子）一再撰文阐述不同见解。^⑦他认为，从表面上看，李祺本显得似乎更精致一些。这是因为李祺本用的是薄纸，用的是扑墨拓法。而库装本用的是厚麻纸，擦墨拓法，还有是“霞蔽亏”三个字，李

祺本完整，库装本有剥蚀，因为这三个字的损泐程度是《醴泉铭》拓本区别先后的重要依据之一，故而后人有重李本轻库本的偏见。朱文强调指出的是：通过另外一些字迹的比较（例如：“丹”，“紫”，“宜”，“承”），发现库本的捶拓时间应比李祺本早一些，李祺本的貌似完美是动过手脚的，比如“长廊四起”的“四”下半部，“霞蔽亏”三个字都有填墨描补痕迹。

1993年9月中旬，我到北京故宫去把李祺本、库藏本和端方本影印件放在一起，并几对观。说实在话，上述朱先生的意见未能引起我的充分重视和完全认同，意外的发现是，李祺本原件，无论在阳光下看还是在放大镜底下看，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从侧面，那字口都看不出一点儿立体感来（即挤压痕迹和积墨痕迹）。近现代的碑帖考据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认为，拓本字口处有无立体感是判别真拓片和赝品的重要标志之一。当时在场的保管组负责人艾志高先生也看不出立体感来，而放在旁边的库装本的字口立体感却看得十分明显。艾先生答复说：“近四十年来已有好些专家看过，鉴定过，还会有假吗？”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字画、碑帖的作伪高手，代不乏人。米芾和秦惠田只是我们已知的少数人而已，自从化学、物理分析方法引进文物鉴定领域之后，各国博物馆近年来新闻迭出，不少经权威专家早已认定，并珍藏多年的古迹珍品被鉴定为赝品。我现在还没有条件就此作出新的推断，我也无意于亵渎神圣，硬说李祺本有假。但我深信，只有经过现代科学方法测定的文物，其结论才能大体可靠。

1993年11月27日下午，我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板厂胡同34号拜访了八十高龄的朱家溍先生，当我进一步探寻社会上重李祺本轻库装本的原因时，朱先生道出了如下一段“隐秘”：

原来张效彬是朱家溍的舅舅，也就是朱翼盒的内弟。朱、张二氏世代都是北京城有名的碑帖收藏家、鉴赏家。解放前，姐夫和内弟有隙。解放后，当政府请张效彬等鉴定故宫所藏四种《醴

泉铭》宋拓本时，张在跋文中没有对“萧山朱氏藏清内府库装本”作公允的积极的评价，过分偏向李祺本。究竟1962年文物出版社影印李祺本所附的鉴赏结论和张效彬的跋文所显示的价值倾向，是否有私人恩怨隐约其后？上述情况聊供参考。

李鸿裔旧藏本

这一拓本在张彦生和王壮弘的有关著作中没有提到。由于原为清朝金石收藏家李鸿裔所藏而得名，该本现藏日本三井文库，最近出版的《听冰阁墨宝，原色法帖选》即是该拓本的影印本。从笔划的损泐状况来看，它的捶拓时代与端方旧藏本接近，接近于擦墨拓中的精拓。但是，它的笔划比端方本略粗，居于李祺本和端方本之间。拓墨略淡，空白与墨的界线不甚分明，这一点与端方旧藏本不同。可以说它是《九成宫醴泉铭》宋拓精品中的第三本。

岳雪楼旧藏本

据说该拓本原初为王子展收藏，后转归清末大收藏家孔广陶之“岳雪楼”。附有汪士铢、翁方纲、吴荣光、何义门等名家的题跋。王壮弘认为是南宋拓本。文字的损泐状态与端方旧藏本相近，石碑最下段的文字，剪裱时失落了。此本字划肥阔的程度与李祺本接近，也发现有填墨描补的地方。中华书局在解放前出过珂罗版影印本，但印刷不够清楚。

关于翻刻本

古代由于交通不便，原石旧拓得之不易。于是好事者就有将善拓本翻刻上石。就《醴泉铭》而言，宋时已有翻刻本。宋翻宋拓本以姚鼐惜抱轩长跋本为最旧，后归景贤，标题唐拓。界格依旧，字迹清晰，有影印本。又有所谓赵孟頫各家跋本，标题唐

拓，但字瘦不佳，也是翻刻本，有正书局有影印本。此外还有明万历神庙本等，北京、山东、扬州皆有重刻，不胜枚举。

乾隆年间无锡秦惠田翻刻本最负盛名。其底本是旧藏“栲”字不损本（宋拓）。秦氏多用旧纸旧墨，捶拓也仿宋法，其逼真和精美的程度几可乱真。初拓本至清末竟价值白银百两。然而秦刻也有两种，一肥一瘦。秦氏亲自所刻本较肥，秦氏刻工夜间以秦氏祖本于灯下私摹本较瘦。若仔细查核，日摹本与夜摹本都有多处与原拓不合，特别是第十四行“乾象之精”。之“乾”字，原拓“曰”部中有石泐痕模糊似田字，摹刻本则明显地刻为田字。但凡摹刻，总有破绽。所谓精品，也只是不易觉察，破绽少一点罢了。

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原有正书局影印的所谓《翁藏宋拓九成宫》，曾妄称是“海内第一本”“墨拓之皇”。末尾有退闲老人、寄尘、瓶庐的跋文。瓶庐就是翁同和晚年的别号，是伪跋。此本的刻工技艺不算精良，“马脚”较多，而剪裱为每行七字，与“李祺本”的六字本和“端方本”的八字本一眼可别。遗憾的是，八十年代以来，仍有不少出版社把它当成宝贝出版，其中中国书店1988年、天津古籍书店1986年就印行40,000。在善拓本普遍冷藏深宫秘府的时代，精良的翻刻本及其影印本的大量发行，对于“嗷嗷待哺”的文化界来说似乎也起过某种好作用。但是在“李祺本”和“端方本”的影印本已广泛普及的情况下，继续滥印翻刻本有什么好处呢？除了混淆视听，误人子弟外，还能有什么好作用吗？

关于《醴泉铭》拓本源流的研究，近年来日本玄士社主宰表立云的成果是较突出的。他企图采用现代科学中“实证”的方法去弥补和发展传统金石学的不足，使我很受启发。他设计的“新旧拓本损字比较表”，虽然是王壮弘的科研成果，但比王书清晰易懂多了。王壮弘的说法与张彦生的说法小有不一，可与张彦生

的《善本碑帖录》进一步对比。

注:

①参见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九成宫醴泉铭”，第483—488页。

日本艺术新闻社《墨》杂志1992年3—4月号伊藤滋：“九成宫醴泉铭的拓本比较，”表立云：“学习九成宫醴泉铭拓本的实证研究”第48—57页。

上述日本伊藤滋文，有两处错误：A.“朱家潜”应为“朱家潜”。B.朱家潜的《大小欧阳所书碑》发表在1962年的香港大公报的“艺林副刊”上。在《艺林丛录》一书中未见收入此文。

②③④《醴泉铭与欧阳询》陕西麟游县博物馆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麟游胜迹》，麟游县博物馆1988年自印本。

⑤⑥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⑦参见朱家潜《碑版鉴定问题举例》，《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2期。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



参见《九成宫醴泉铭》（文见P171）